

湖北省立农学院《农业学报》创刊号评述

王 蓉

(华中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 1946年11月,湖北省立农学院发行的《农业学报》创刊号,收录九篇文章,主要阐述了四个方面的问题:分析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弊端——知行分离;阐明近代中国农业教育的目标——知行合一,手脑并用;对农业科技的研究(湖北省的土壤改进)及学科前沿成果(主要是美国农学界研究成果)的介绍;农民问题(“农民”概念分析及农业劳动力问题阐述)。学报内容体现了湖北省立农学院的教师们对农业教育、农业科技与农村及农业发展的基本宗旨与规划,并可从中窥见近代中国农业教育、农业科技以及农业与农村社会的诸多问题。从《农业学报》到今天的《华中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与社会科学版,学报的内容不断丰富,形式在发展变迁,而学报的宗旨始终是致力于中国农业科学、农业教育、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 湖北省立农学院;农业学报;农业教育;农业科技;农民问题

中图分类号:K 2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18)05-0001-09

DOI 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18.05.001

1940年11月,自湖北农务学堂发展而来的湖北省立农业专科学校在恩施改建为湖北省立农学院,1945年12月,湖北省立农学院由恩施迁回武昌宝积庵旧址,“师资队伍与其他农学院比,质量较高,数量较多”^[1]。1946年11月,湖北省立农学院于第六届校庆之际,发行《农业学报》创刊号。《华中农业大学校史(1898—1998)》记载湖北省立农学院编撰与出版的书刊时,记有校庆2周年和6周年纪念专刊共2期,《农业学报》1期。笔者以为,6周年纪念专刊,应即《农业学报》创刊号,因该刊首篇即《农学院第六届校庆献辞》。

笔者所见《农业学报》为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期刊资源库民国期刊类之中的扫描件,总计48页,图1为目录页。从字迹清晰程度来看,原刊应为油印件;繁体竖排,每页分上下两部分排版;从页码标注情况(单号在左双号在右)来看,应为对开本;每页字数约为900字(按《略论本省农业人才之培植》一文约1800字占2页统计),全刊除目录、作者介绍及封底之外,正文45页,共计约40000字。编目依次为:1.封面:《农业学报》创刊号要目;2.学报编者撰《农学院第六届校庆献辞》(代发刊词)(占一页,未编页码);3.院长管泽良教授撰《略论本省农业人才之培植》(P1-2),篇末附《本省土地面积及耕地》表;4.古龙撰《农民,农民》(P3-6),篇末附孙中山重视农民问题的一段话;5.农艺学系主任王庆延教授撰《改进本省土壤之意见》(P7-8);6.农业经济系主任王一蛟教授撰《农业教育与农业经济学科之教学》(P9-12),篇末附《本省各区市农户统计表》;7.农艺学系徐叔华教授撰《土壤学最近发展之趋势》(P13-16);8.胡笃敬教授译《种子之发芽生理》(P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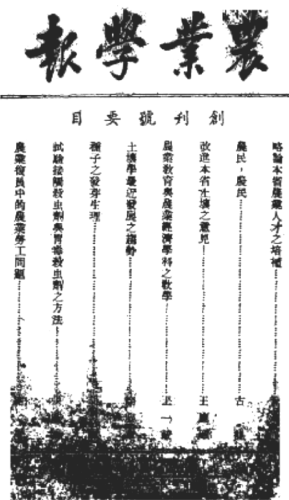


图1 《农业学报》目录页影像

收稿日期:2018-03-16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华中农业大学近代校史研究及其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应用”(2662018YJ032)。

作者简介:王 蓉(1972-),女,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农村社会史。

26),篇末附有《本省耕牛估计》表(民国三十二年);9.植物病虫害系副教授张继华撰《试验接触杀虫剂与胃毒杀虫剂之方法》(P27-38),篇末附有《本省主要农产年产量》、《本省主要特产年产量》、《战时本省棉花产量》(截至三十一年止)三表;10.农业经济系副教授谢澄撰《农业复员中的农业劳工问题》(P39-44),篇末附有《八年来本省棉田面积及产量》表;11.作者介绍;12.封底白页。

创刊号实际刊登九篇文章。这些文章所阐述的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分析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弊端——知行分离;阐明近代中国农业教育的目标——知行合一,手脑并用;对农业科技的研究(湖北省的土壤改进)及学科前沿成果(主要是美国农学界研究成果)的介绍;农民问题(“农民”概念分析及农业劳动力问题阐述)。

一、分析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弊端——知行分离

《农学院第六届校庆献辞》追述中国传统农业的发展历程,分析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时认为:中国之农业,虽滥觞于炎帝,实极盛于有虞。厥自兹以往,历数千年,陈陈相因,进步迂滞。虽田制代有变更,税法时有损益,然究其所变更,所损益者,或仅属所有权之转移,或仅属纳税人之负担,对于农业技术,殊无改进之可言。历代帝王所标榜之重农政策,率皆倾向于农政,未尝涉及于农学,驯至心与力为二致,农与学为殊科。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者,全为不识不知之农民;反之,不勤四体,不分五谷者,尽为多才多艺之士大夫,偶有一二特立独行之士,如长沮,桀溺,接舆,丈人之流,固亦曾“耰而不辍”,“植杖而芸”者,然此辈又皆避世之士,思藉南亩西畴,为其个人之乌托邦者,究未可以一概论。

该文认为,传统时代的中国,有知识有能力的阶层,并不从事农业生产,重农政而轻农学,因而很难对农业科技做出贡献,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又因缺少文化知识而无力改进农业科技,故而“始终局限于农业之范畴,未尝跨至农学之领域。”换言之,该文以为,传统时代的中国,因为“心与力为二致,农与学为殊科”,以至于有农业而无农学。

这一观点,涉及两个问题。

1. 中国传统农学的有无问题

对于中国传统农学的有无问题,目前学界普遍的观点,还是肯定其“有”,并认为应总结与吸取传统农学的经验如天人合一思想等,以作为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借鉴^[2]。

该文认为,传统时代的农业,一则农业技术“殊无改进之可言”,二则有农政而“未尝涉及于农学”,进而否定传统时代农学的存在,其原因或有两个方面:

其一,近代中国正当破旧立新之际,但历史发展的惯性带来重重阻碍,故求新求变者常以激烈的自我否定来推开强大的阻力、开拓学习西方科技文化之路径,农学研究及农学教育也不例外;其二,中国传统农学是基于整体观察、外部描述和经验积累的“经验农学”,其出发点在于人与自然的协调,而近代西方基于个体观察、内部剖析和科学实验的“实验农学”,其出发点在于人对自然的征服,更具有实效性,由此在世界范围内发展成为占主导性地位的科学体系^[3],该文以近代的实验农学指代农学,故曰传统时代的中国并无农学。

2. “知”与“行”的分离问题

其一,就知识阶层的知行分离而言,该文以为,士大夫阶层“不勤四体,不分五谷”,有知识有能力却不从事农学,是有“知”而无“行”。这一论断,或有其时代背景的影响,客观来看,有失武断。中国古代农书共计五百余种,流传至今三百余种,其中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元·司农司编《农桑辑要》、元·王祯《王祯农书》、明·徐光启《农政全书》、清·鄂尔泰《授时通考》内容最丰富,影响最大,被称为“五大农书”^[4]。显然,中国传统士大夫与统治阶层是有编纂农书的传统的。

故而该文所认为的“知”与“行”分离,应从“经验农学”与“实验农学”的区别来理解。中国传统农书的编著者,基本上仍然遵循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主要是对“劳力者”的生产经验与技术进行总结,而非身体力行、通过大量的田间实验、室内实验等“劳力”的方式来探农学理论与农

业技术,也不直接从事与指导农业推广工作。

其二,就农民的知行分离而言,该文认为,农民习于劳作而“不识不知”,是有“行”而无“知”。《改进本省土壤之意见》一文中,认为农民的守旧习惯是农业科技不能进步的原因之一:“国内农民惯于守旧,对于作物品质之改良,土壤性质之改进,化学肥料,新式农具……病虫害剂之使用,向无所闻,倘仍沿用旧法,不事改革,则农村实难有复兴之望也。”农民的因循守旧,未尝不是缺乏知识文化、难以自行改进农业技术的结果,如张之洞所感慨:“大凡农家率皆谨愿愚拙,不读书识字之人,其所种之物,种植之法,此系本乡所见,故父老所传,断不能考究物产,别悟新理新法,惰陋自甘,积成贫困。”^[5]

不过,章楷认为,农民间作物良种和耕作方法等方面的交流,起着农业推广的作用,我们可称之为“交流式的农业推广”,古代的农业推广以这种交流式的推广为主^[6]。从这一论述而言,农民并非有“行”无“知”,只是“知”的层次较低,远不如知识阶层而已;而且这种自发性的交流,传播速度与范围有限,极大地限制了其效率。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知识文化能力之外,农业科技的改进、农学的发展,也需要强大的经济能力。传统时代,有此经济能力的阶层,或鄙视体力劳动(知识阶层劳心不劳力),或依赖于地租收入而无动力成为经营地主(收租地主的盛行);农民有此动力,但无经济能力,无力承担改进技术的成本与风险。这一现象,其实质与知行分离是比较一致的。

二、阐明近代中国农业教育的目标——知行合一,手脑并用

如何解决知行分离的弊端?唯有设立农业学校,推广农业教育,发展实验农学,知行合一,手脑并用,培养兼具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的农业人才,使农业科技能够通过农业人才推广应用于农业生产。《农学院第六届校庆献辞》追述了这一解决方案的提出背景:“在张文襄督鄂时,于武昌宝积庵,创设高等农业学堂,备全省之菁英,作农学之研究,知行合一,手脑并用,开一时之风气,树百代之宏规,诚盛事也。”

《略论本省农业人才之培植》在简介湖北农业环境及目前高、中级农业教育机关之后,着重提出了对湖北省立农学院今后发展方向的建议:应设立研究所,以培养高等农业人才,负责本省农业建设的规划、试验、研究并督导推广;应充实师资、增加班级,以培养更多的各县执行农业建设的工作人员;在原有农艺、园艺系、农业经济、植物病虫害四系之外,增设森林、畜牧兽医、农业工程等学系,以适应本省农业之需求;“如求农业人才之确能学以致用,则研究推广二者应与教学同道进行”,故亟需落实研究推广经费。这是比较系统的将“知”与“行”结合起来的方案。

《农业教育与农业经济学科之教学》则阐述了初、中、高级农业教育之目标及相应的农业经济学科的教学目标、课程安排等:初级农业学校按教育部规定旨在培养优秀青年农工,则课程应包括农村社会与经济(侧重当地搜集之素材)、农村调查与统计(学生应多参加当地调查及统计工作)、农村管理(尤应谙习农场簿记)、农村合作与金融(侧重合作社的组织运营规则);高级农业学校旨在造就初级农业技术人才,即农业调查统计的下级干部、合作社的指导员、农业推广员等,课程应包括农业经济学(侧重理论)、农村社会学(侧重农村人口及文化研究)、农村调查与统计(侧重实践学习)、农场管理(侧重具体问题讨论)、农场簿记(原理与具体细则兼学)、合作概论(侧重合作运动历史)、农业金融(侧重农业金融机构之组织与经营)、农业经济实习(调查统计或指导组织合作社农仓)、农业推广(学习推广方法)等;大学农学院或独立学院旨在培植中上级农业技术人才,如合作指导员或视察员、银行农贷调查员或主管员、县合作金库经理或地方农业金融机构之主管员、高初级农业学校农业经济教员、大学农学院或独立学院农业经济研究员或助教、统计机关之农业调查统计员、农业推广员等,则其主修课程至少包括以下十四种:农业经济学、土地经济学、农政学、农村社会学、农场管理学、农产贸易学、农业调查与统计、合作概论、农业金融、簿记与会计、农业经济问题研究、农业推广、合作组织、农产物价,选修科目应包括:物价之研究、土地问题、合作法规、经济地理、农业史、农业仓库、粮食问题等,在此基

基础上,还应酌量根据学生研究兴趣分组深入学习,并“辅导学生课外研究工作”,“视环境的许可及教授的专门研究而谋求少数问题之探讨,这样才能造就出来真正的专门人才”。

将农业教育分为初、中、高级培养不同层次人才的教育模式,张之洞在筹办农务学堂时已明确提出:设初等农务学堂,“以教授农业最浅近之知识技能,使毕业后实能从事简易农业为宗旨”;中等农务学堂“以授农业所必需之知识艺能,使将来首先从事农业为宗旨”;高等农业学堂“以授高等农业学艺,使将来能经理公私农务产业,并可充任各农业学堂的教员、管理员为宗旨”^[7]。三个层次的培养目标,可以依次对应上文所阐述的优秀青年农工、初级农业技术人才、中上级农业技术人才,只是后者的培养计划,增加了诸多配合政府农政的内容。

上文阐述的农业经济学教育系统方案,课程设置强调实用性,重视学生的实践与实习,同样体现了“知”与“行”的结合,体现了对学生“手脑并用”的要求。

“知行合一”,语出王阳明。张之洞又加上“手脑并用”一语,用以作为湖北高等农业学堂开学典礼的训词。不过,《农业学报》阐述的“知行合一,手脑并用”的农业教育目标,并非湖北高等农业学堂的后身、湖北省立农学院所独有,总结近代中国的农业教育,其特点与目标与此是一致的:引入并发展实验农学,教学、科研、推广并重^[8]。这一历史现象,比较类似于张之洞于 1898 年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语概括洋务运动之目标方向,并可用来概定清末新政之目标方向。

三、对农业科技的研究及学科前沿成果介绍

《农业学报》创刊号中关于农业科技的论文计四篇,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 具有针对性的农业技术研究——湖北省的土壤改进

《改进本省土壤之意见》一文认为,复兴农村尤重农业生产技术之改进,改进农业、增加农民收益则须重视土壤改进。作者王庆延教授又以其在鄂西等地的实地考察经验论述湖北土壤改进之意见:通过禁伐森林、缓坡地改梯田、栽培覆盖作物、禁止农民开垦高度倾斜坡地等方式,防治土壤冲刷;提高有机质肥料产量、善用化学肥料及石灰,维持土壤肥力;乡村推广人员应指导农民科学利用各级土壤;政府应资助农民开发生荒熟地;政府应主持兴办农田水利工程;改革烧山之陋习、耕耘之失当等问题。这是非常具有针对性的农业技术改进的阐述。该文中论及的耕殖不当造成土壤冲刷破坏的问题,反映的是紧张的人地关系造成的后果。这一紧张关系,在明清时期有越演越烈之势,1793 年,洪亮吉在他的《言意》第六篇《治平篇》中指出,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余年,社会较安定,“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而空屋、空地最多“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这就必然造成“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人口增长过快必然会造成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不足,洪亮吉的忧虑也正在于此。因为人多地少,于是出现了人与森林争地、过度开荒以至于土壤冲刷与破坏严重的现象。而土壤肥力下降,与农民经济状况的恶化,也有直接关系。

孙达人研究认为,明清以前,土地和人口比例比较宽松,至明清时期,因为人地关系的紧张,平均每户占田不过 10 亩左右,个体农户出现了三点变化:小,耕地面积大大缩小,生产工具随之退化,成为名副其实的小农和小农经济;少,财产很少,必须从事纺织或其他副业才能维持生存;散,缺乏组织,一盘散沙^[9]。土地委员会 1937 年 1 月汇总的关于全国 16 省(不含东北)163 县 1 295 001 户农家土地占有状况的调查便显示,至 1936 年底,大部分农民平均每户占有土地在 10 亩以下^[10],则个体农户的小、少、散的趋势,至民国时期,无法扭转,更有加剧之势。个体农户的小、少、散,使其生产条件日趋简陋恶劣,无力维持土壤肥力,土壤劣质化又使得农民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从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禁伐森林、改进施肥、科学利用、政府资助等农业改进措施,对于土壤保护有很强的针对性与实用性,不过,在人多地少、农民普遍贫困的背景之下,要起到有效作用,还需要解决禁伐森林、限制开荒后,被减少了耕地的农民的生计问题,以及政府资助的经济来源与执行能力问题。

2. 学科前沿成果的介绍——以美国农学界的成果为主要内容

《土壤学最近发展之趋势》阐述了美国农学界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土壤学研究新学说:土壤物理方面的水份新学说、水份测定、黏土矿物、结构;土壤化学方面的溶液说、溶液之提取、植物营养料之分析、微量营养素之研究、阿母尼亚气为氮肥;土壤微生物方面的根瘤菌之研究、关于天然肥料问题;土壤冲刷方面的政府工作。并认为,这些成果的取得,在于“善用现代之科学工具与基本科学原理”,并感慨我国土壤学受限于仪器与经费而进展缓慢。

《种子之发芽生理》为译文,原文出处不明,主要内容包括:阐述种子的化学成分,影响种子发芽之诸因子如种子成熟的程度、年龄、消毒处理、水、温度、氧、肥料、溶液之负离子及氢氧离子浓度,发芽种子之新陈代谢作用等。

《试验接触杀虫剂与胃毒杀虫剂之方法》引用西方农学文献 76 种,介绍了学界(主要是美国农学界)试验杀虫剂的几种方法:接触杀虫剂之方法有喷射药液、浸渍法、小吸管滴出药液法、喷粉;胃毒杀虫剂之方法有滴液法、夹心叶片法、龟试法、苹果栓法。结果分析认为,目前的试验多侧重于实验室内之精密试验,很少举行田间试验,欲推广应用,需要将施用药剂的方法与受试昆虫都实行标准化,尽量减除试验环境的差异,并准确记录试验结果,绘制浓度死亡曲线、时间死亡曲线。

这三篇论文介绍的学科前沿成果,以美国农学界的成果为主要内容。之所以如此,主要应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美国农业科技水平代表了当时世界的一流水平。张之洞筹办农务学堂时即称:“农政修明以美国为最”,“美国尤以农业致富”^[11]。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农业就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农业规模巨大而农业科技发达,在近现代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对此研究者多有肯定^[12]。而美国农学界对农业科技的研究,也长期居于领先水平^[13]。所以,追踪学科前沿,基本上也就意味着主要追踪美国农学界的科研成果。

其二,近代中国农业教育与农业科技,受美国农学界的影响比较明显:来华传教士创办了教会大学的农科院系(著名者如金陵大学农学系),来华农学家协助创建了美国式的科研、教学、推广一体的中国近代农林科技体系,培养留美中国农科学生及其他农林科技人才^[14];棉产改进主要是引进、驯化、繁育与推广美棉^[15]。1945 年,国民政府又向美国政府提出申请,希望能够仿照金陵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作物改良计划,借助美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来帮助中国进行战后农业经济恢复和重建,为此于 1946 年 5 月成立了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由 13 名中国农业专家和 10 名美国农业专家组成,分赴各地实地考察,撰写《改进中国农业之途径——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报告书》,于 1947 年 5 月由中美两国政府同时公布^[16]。

其三,湖北省立农学院的学术氛围受美国农学界影响较深。张之洞筹建湖北农务学堂时,曾聘请康奈尔大学农学士布里尔等美国教习至鄂,是为中美官方农业科技交流之始,布里尔在华工作三年,引进优良品种,推介国外农具和书籍,传播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与农学思想,是湖北农务学堂的主要筹建者之一^[17]。因此,湖北省立农学院的学术渊源,本身即要追溯到美国农学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因为政府的亲美趋向、抗战时期的中美同盟关系,也因为留美学生以及受美国学术界影响较大的国内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地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农业教育与农业科技领域的美国影响,也更为明显。湖北省立农学院自不例外。农学院第一任院长张伯谨(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兼)即为康奈尔大学教育博士。1940—1945 年湖北省立农学院历任教授 29 人,其中留美博士二人(院长管泽良与兼职教授、农改所所长戴松恩),留美硕士六人,有留美经历者四人,占 40% 以上,再加上金陵大学毕业(不含留美)六人^[18],则具有美国农学背景的教授,占绝对优势,直接影响乃至决定了整个农学院的学术氛围。

其四,论文作者自身的美国农学教育背景。撰写《土壤学最近发展之趋势》一文的徐叔华教授,1935 年进入受美国农学界影响的金陵大学农科就读,1938 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40 年考取该校农业研究所土壤系研究生,1945 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及加利福尼亚盐碱土研究室实习,次年回国任教。翻译《种子之发芽生理》一文的胡笃敬教授,为清华大学研究生,清华原称“清华留美预备学堂”,与美

国学术界关系密切。

基于这几个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农业学报》的学术论文在介绍学科前沿成果时,着重介绍的是美国农学界的相关成果,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四、《农业学报》阐述的农民问题

《农业学报》关于农民问题的两篇文章,其一是分析“农民”概念,其二是阐述战后农业劳动力问题。

1.对“农民”概念的分析

《农民,农民》一文,开篇即提出,要解决农民问题,应先分析“农民”这一名词。之后分析了通常的“农民”概念的不准确:有以社会分工将“农民”定义为从事农业的人口,但农业包括许多部门,关系错综复杂,社会分工不彻底,职业界限不明确,故农民的身份亦难确定;有以住在地将“农民”定义为住在乡村的人口,但“乡下人”不一定是农民;有以作业种类将“农民”定义为“种庄稼的”或“种田的”,但农业范围常包括农林渔牧、农产加工运销以及园艺业等,从事者是否能够统称为“农民”?政府文件将“农民”定义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之人民”,这一概念比较准确,不过还须补充完善:“以全部或大部分的劳动,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从农业生产获得全部或大部分的收入”。作者认为,农民占中国人口大多数,表示“我们的产业不发达,农民的人口过剩”;农业改进目标有“农业本位论”与“农民本位论”的争论,作者认为,二者不能偏废,而农民的利益和其他国民的利益,也应该兼顾,“不可有无理的偏倚”。全篇主要是分析“农民”这一概念应如何定义,结尾处则表明了对如何解决农民问题的一点看法,希望能有一个兼顾各方利益的方案。

近代中国的农民问题,实质上是土地问题。《农业学报》出版之时(1946年11月),全国解放战争正在进行(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内战、解放区军民自卫还击,解放战争开始),这场战争实际上可以视为近代中国对于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两种不同方案的对决。南京国民政府虽以民生主义为旗帜,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并曾试行二五减租、扶助自耕农等土地改革政策,但总体而言,还是想要在不动地主利益的前提下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以至于土地问题的解决遥遥无期,农民的生存问题迫在眉睫,农村矛盾越演越烈;中共则提出了土地革命的目标,直接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

《农民,农民》一文希望兼顾农民与其他国民的利益,实际上是希望在这两个方案之间寻求平衡,或者说,该文作者认为这两个方案都有偏倚一方的问题,所以希望寻找不偏不倚的第三个方案。这一政治立场,与这一时期大多数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的政治立场是比较一致的。

不过,《农业学报》的宗旨,是为了推进农学、发展农业,进而利国利民,因此,虽然该文作者隐晦地表达了对国共双方的土地方案的不赞同,希望能有兼顾各方利益的方案,但其宗旨,仍然是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正是基于这一宗旨,湖北省立农学院的教师们,政治立场逐渐发生了变化,从对国民政府的失望,转而越来越倾向于革命政权,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地下党组织的护校活动,就得到了教师们的大力支持^[19]。

2.分析抗战胜利后农业劳动力不足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农业复员中的农业劳工问题》一文阐述了农业劳工的季节性、伸缩性、不专业化的特点,进而分析抗战胜利后农业劳工减少的原因,包括:直接原因在于兵役伤亡,间接原因在于农民离村与逃亡;农业劳工减少带来了产量降低、工资提高、童工女工增多、流行早婚等影响。并提出补救对策,包括:利用士兵扶助农作、提倡集团工作、利用农期参差性、变更农业方式(变换作物种类或增减作物面积)、提倡合作农场、利用役畜等。

抗战胜利之后,由于国民党发动的全面内战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崩溃,农村经济衰败的趋势日益严重,1947年广东乡绅一份建设救济农村经济枯竭的呈文中,对这一问题有极痛切的阐述:“我国农村经济之枯竭已达极点矣,遍地有呼呈啼饥之声,到外有颠沛流离之状,瞽目农村无一乐景,推其原因

由,虽不一端,而其最大最著者为生产落后与高利贷是也。盖我国向无农官专政,荒山旷地甚多,生产既然落后,及抗战后又因征兵征夫战事种种影响,以致生产更不如前,最近两年金融动荡,物价飞涨,农民因生产落后而借食日多,贷主亦因谷价飞涨而高利……”^[20]国民政府的档案文件中,对这一时期农村的衰败也多有反映,如:1946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编黄泛区损失统计表》,1946年2月《马庭松等陈述豫北遭受日寇蹂躏及水旱蝗灾造成田园荒芜人相食的代电》,1948年11月《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刘世英等因甘肃省农村破产哀鸿遍野建议紧急救济及速拨水处贷款的书面意见》,以及1945—1948年有关各省灾情的视察报告等等^[20]。由此可见,1946年的农村与农业,面临的困难,远不止劳动力匮乏一项。

《农业复员中的农业劳工问题》一文,从标题和内容来看,应写作于抗战胜利不久,分析农业劳动力缺少的原因时,着重强调的是长期抗战带来的兵役伤亡(军队征发的主要是青壮年农民);而论述利用士兵扶助农作时则称:“目下国家虽在整编军队,而各县驻留军队数额或未编遣士兵尚不在少数,此时正可利用此辈不作战空闲着的人手来帮助农家工人……现有士兵大多亦是出身田间的农家,如是在农忙时劳工可不发生问题,则平日一切工作,仍可不受因农业劳工缺少而依然进行着”。

农业劳动的季节性特点以及机械化程度的长期低下,使得农忙时节尤其严重依赖于劳动力的投入(南方水田区尤甚)。农忙时务农、平时为兵的方式,于中国古代行之有效的军屯,有较为明显的借鉴之处。因此,该文提出的这一解决方法,就抗战胜利后不久这一时间段而言,是有其现实可行性的。但是正忙于准备内战的南京国民政府,显然不能采纳这一建议。

1946年底,内战正激烈,南京国民政府不断在农村征兵,农业劳动力紧缺的程度更形加深。《农业学报》创刊号于此时刊登此文,虽然全篇均未触及内战,但究其言外之意,或有希冀铸剑为犁的殷殷期望。

五、从《农业学报》到《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的发展历程

这一时期,农业教育与科技发展在经济困难、政治动荡之中受到重重阻碍。故《农业学报》目前只见创刊号一期,而无下文。金陵大学农学院自1924年开始出版的《农林新报》,同样止于1946年。1949年5月,武汉解放,6月,武汉市军管委接管了湖北省立农学院,农学院进入了恢复与重新发展时期,1950年10月,更名为湖北省农学院,并发展成为今天的华中农业大学。从湖北省农学院到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的发展历程,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阶段:

1.《湖北农学院通讯》(1950—1951)

1950年11月,以“湖北农学院通讯编辑委员会”的名义,出版了《湖北农学院通讯》第一卷第一期,刊头为徐特立题辞。刊头中为“湖北农学院”而非“湖北省立农学院”,具体原因尚不可知。不过本期开头刊登的黄人俊撰写的《本院简史》,回顾总结了农学院的发展历程:高等农业学堂时代,即张之洞创办的湖北农务学堂;高级农业中学时代;教育学院时代;农业专修科时代;1939年秋成立的湖北省立农学院;人民政府接管农学院时代。所以,该刊即湖北省立农学院出版的院刊。

该刊现藏于华中农业大学图书馆密集书库(下文简称为“密集书库”),为第一卷第一期至第十二期合订本,出版时间从1950年11月到1951年11月,内容包括科学研究、校务工作、农业信箱等。第十二期为农学院建院(即湖北省立农学院)十一周年纪念专辑,李先念、郑位三等人为此题辞纪念。

《湖北农学院通讯》与常规的学报有所不同,校务工作占的篇幅较多、份量较重。但该刊最主要的内容,仍是农业科学研究,卷末的“农业信箱”栏目,也是以来信问答的方式来进行农业推广、力图通过普及农业科技来改进湖北农业。所以,该刊实际上延续了《农业学报》的办刊精神,虽无学报之名,而有学报之实。

2.《华中农学院学报》(1956—1959)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湖北省农学院合并了武汉大学农学院,并吸收了南昌大学农学

院、河南大学农学院、广西大学农学院、湖南农学院、江西农学院、中山大学农学院,改组成为华中农学院,师资力量与科研力量有了明显的发展。

1956年,《华中农学院学报》创刊。创刊词里,集中阐述了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并明确提出,本刊目的是为了总结教师的科学研究经验,以推动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栏目包括:农学、园艺、土化、植保、森林、农经、学生科学小组。内容上以自然科学为主,但也包括了社会科学方面(农经)。卷末附有俄语目录,这也是与当时的中苏关系密切、农业科技受苏联农学影响较大有直接关系。

该刊为年刊,1~3期合订本亦藏于密集书库。1957年出版了第2期,1958年中断,1959年出版了第3期也即《下放专辑》,分为农学、园艺、植物保护、土壤农化、畜牧兽医、农业机械六个分册。之所以副标题名为《下放专辑》,是因为按照1958年教育部在南京农学院召开的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育结合生产劳动经验现场交流会的会议精神,高等农业院校的师生一律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锻炼,同年11月,华中农学院1758名师生下放应城、天门两县,745人下放本院农场,时间共8个月。因此1959年12月出版的《华中农学院学报》第3期,实际上是总结这一段下放时期的农业科技推广实践的经验。

3.1981年《华中农学院学报》自科版复刊,社科版创刊

1981年,《华中农学院学报》复刊,并一分为二,自然科学版独立出版,因此复刊后在封面上标注为《华中农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同年,社会科学版创刊,初为内部出版,渐次由年刊、半年刊而至季刊,直至今日的双月刊。惜乎目前资料不全,尚未能搜集到社科版创刊号的纸质版或扫描件,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等处的《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也只在收录信息中显示了创刊时间(1981年),而无馆藏。

密集书库中,所藏的年份较早的社科版学报,目前所见为1985年第2期,名为《华中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卷末有“第4卷第4期”之字样,对照密集书库所藏自科版学报1983年第1期目录上标注为“第二卷第一期”,可知1981年的学报并未按卷数排序,1982年始为第1卷,由此类推,社科版学报虽创刊于1981年,实际上也应从1982年始排序第1卷,故1985年为第4卷。

该期学报的责任编辑为李赛民、朱启禅、葛松林,栏目包括:哲学、党史、共运史、粮食经济、渔业经济、土地利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村专业户、统计、农业保障、技术论、智力开发、语言文学、书讯等。在卷末的征订启事中说明:因自1986年起华中农学院更名为华中农业大学,本刊不再赠阅、交换,需要评阅,每年四期。

从这一期学报中,大略可以窥见1981年社科版创刊号的面貌。从原来基本上从属于自科版、合称为学报,就此真正独立发展起来,栏目的丰富也充分说明了内容的独立与丰富。

4.《华中农业大学学报》(1986年一)

1986年,学报更名为《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继续分为自然科学版与社会科学版。自然科学版的留存资料较为丰富,社会科学版的资料较为欠缺,目前能够搜集到的较早时期的社会科学版学报,是密集书库所藏的1989年总第11期,责任编辑为易法海、葛松林、程为仁。主要栏目包括:农业经济问题探讨、中国革命史研究、思想教育论坛、党的建设、写作、其他等等。栏目较之1985年第2期有明显简化,将诸多相关主题都纳入到了“农业经济问题探讨”这一栏目之下。1992—1994年的社会科学版学报,多数论文继续集中于农业经济问题探讨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两个主题上。

1998年,经国家新闻总署的批准,社会科学版学报取得正式刊号,公开出版。目前《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主要栏目有:农业经济、农村社会、土地问题、农业法学、世界农业与农史、经济与管理等,在农业经济问题探讨的传统重心之上,进一步拓展研究内容,涵盖整个“三农”问题,并使之成为社会科学版的中心内容。

从1946年湖北省立农学院《农业学报》创刊号,到今天的《华中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与社会科学版,人事有代谢,时代亦变迁,然而贯穿始终的办刊宗旨仍然是刊登农业各学科具有创新性与强烈现实意义的研究论文、文献综述,报道校内外各项重大科学教研成果,致力于中国农业科学、农业教

育、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的发展。

值此120周年校庆之际,以曾经沉落史海已久的《农业学报》为中心内容,追述本校学报的历史,追思学报历任编纂者、历代作者的殷切期望,是为不忘诸贤的纪念,也是为继续前行的勉励。

参 考 文 献

- [1] 华中农业大学校史编委会. 华中农业大学校史(1898—1998)[A]. 武汉:华中农业大学,1998.
- [2] 严火其. 传统农学与农业可持续发展[J]. 中国农史,1998,17(2):101-108.
- [3] 曹幸穗. 启蒙与体制化:晚清近代农学的兴起[J]. 古今农业,2003(2):41-47.
- [4] 王毓瑚. 中国农学书录[M]. 北京:中华书局,2005.
- [5] 朱有骥.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 [6] 章楷. 我国历史上的农业推广述评[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1):57-63.
- [7]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8] 包平,王利华. 略述中国近代农业教育体系的创立(1897—1937)[J]. 中国农史,2002,21(4):33-38.
- [9] 孙达人. 中国农民变迁论——试探我国历史发展周期[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 [1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七[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3.
- [11] 刘成. 光绪末年张之洞与湖北农务学堂的创办[J]. 历史档案,2017(2):123-126.
- [12] 王琛,吴敬学. 美国农业技术进步经验及其启示[J]. 世界农业,2014(6):19-23.
- [13] 王思明. 美国农史研究回顾与展望[J]. 古今农业,1997(1):60-66.
- [14] 刘家峰. 基督教与近代农业科技传播——以金陵大学农林科为中心的研究[J]. 近代史研究,2000(2):177-204.
- [15] 刘阳. 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对美国棉花品种的引进、改良及推广[J]. 中国农史,1999,18(3):48-54,71.
- [16] 韩丛. 《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报告书》研究[D]. 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15.
- [17] 石松,王思明,盛邦跃. 布里尔与湖北农务学堂的筹建[J]. 中国农史,2017(5):36-48.
- [18] 滕莺莺. 抗战时期湖北省立农学院研究(1940—1945)[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6.
- [19] 刘佑庭. 湖北省立农学院的地下斗争[J]. 武汉文史资料:纪念武汉解放60周年特刊,2009:62-64.
- [2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财政经济六[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金会平)